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1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一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Study on the Sinicization History of Marxism

总主编 顾海良

第一卷 1919—1949

本卷主编 丁俊萍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1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第一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Study on the Sinicization History of Marxism

总主编 顾海良

第一卷 1919—1949

本卷主编 丁俊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1卷，1919~1949/丁俊萍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6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1辑)
ISBN 978-7-300-21558-7

I. ①马… II. ①丁…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国- 1919~1949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9923 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一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第一卷

1919—1949

总主编 顾海良

本卷主编 丁俊萍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770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36.25 插页 1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70 000	定 价	87.00 元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总序

顾海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过程中，总结中国的实际经验，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使从中国实际中得出的新的思想、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和新形式。这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前者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这两个方面交互作用、结为一体，呈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包含了上述两个方面及其内在统一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性，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昭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这些基本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四卷本研究的主题和要旨。

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及其统一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分作四卷：第一卷：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第二卷：1949年新中国



成立到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第三卷：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到 1992 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第四卷：1992 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根本原则和主要方法的

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就其理论体系而言，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特征就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特征，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革命性的高度统一。相对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而言，基本原理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具有普遍和根本的指导意义”^①。作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构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石。没有基本原理，就没有这一理论体系；不坚持和发展基本原理，就不能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多样性的生动体现。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②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破除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或外国现成经验的有害的做法和错误的思想观念，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光辉旗帜，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精神支柱。

1938 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时就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

^①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 90 年来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及历史启示》，载《学习时报》，2011-06-28。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4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 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得到进一步弘扬。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 的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实践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即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之下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化”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特征，深刻地蕴含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之中。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对事物“过程”的重要意义作过深刻论述。他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是“伟大的基本思想”^③。事物的“过程”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事物本身和作为对事物反映的思想都处于历史的“过程”之中。对事物“过程”的历史探索就成为把握事物本质和特质的必然视界。无论是历史逻辑还是理论逻辑问题，抑或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问题，实际上都是事物发展“过程”在思维中的再现。恩格斯晚年把“历史史实和发展过程”的结合问题，提升到党的思想方法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65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① 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方法论要义。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以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相继发生的历史性转变为基本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以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为出发点的。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就是以中国社会和时代发展为背景的，是以中国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展开的。

自20世纪初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相继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转变：一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二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三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三大历史性转变，既有社会根本制度的变迁，有经济社会运行体制的变革，也有两者的并举和交错。这三大历史性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创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就是以这些“历史性变化”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的。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社会危机四起、战乱频发，人民苦难深重、民生凋敝，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探寻。自此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70多年间，“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②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①。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对当时纷至沓来的各种理论思潮和学说的反复比较鉴别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开始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探求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直面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的结合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毛泽东总结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毛泽东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③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此“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经过28年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

① 《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同上书，14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5、796页。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践证明，“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時代应当完结了”^①。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行，写就了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新篇章。

肇始于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更是以第三大历史性转变为社会和时代背景的。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历史潮流，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这一历史性转变过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提出了新的诉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成为推进社会和时代发展、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光辉旗帜。

在回顾新时期以改革开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进程时，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

^① 《毛泽东选集》，2 版，第 4 卷，1516 页。

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①

回望历史，习近平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②牢牢把握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紧紧扣住中国社会历史性转变过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为形态特征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主要思想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在1938年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③，1942年又提出要追求一个“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④的要求，这两个重要观点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特征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密切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一词出自《汉书》，《汉书·河间献王传》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理解，这就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11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② 同上书，49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659页。

^④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20页。



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实事求是”这一旧典，有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内涵。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深相结合”中，还体现于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相结合”中，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②。这两个方面的“深相结合”，紧密相连、相互辉映。如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强调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基本方法，在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得到新的运用和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思想，这里的“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千百年来，“小康”或“小康之家”一直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对殷实宽裕的生活的一种说法。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进行思考时，总结历史经验，立足现实国情，将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和百姓的民生追求融为一体，赋予浸染着深厚传统文化意蕴的“小康”一词以全新的时代内涵。1984年3月，邓小平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④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理论，都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

①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0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4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658~65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54页。



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广大人民群众耳濡目染的方式，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质和理论形态。

党的十八大后，在谈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习近平提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①的新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文化沃土。习近平提到：“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②这里提到的“政治抱负”、“报国情怀”、“浩然正气”和“献身精神”等方面的精神与美德，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

习近平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他提到：“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所有这些思想和理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蕴含了“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③。

①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载《人民日报》，2014-02-24。

②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3-03-03。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70～171 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粹，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怀的思想文化源泉。习近平作过这样的释义：“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①深刻理解“修身”、“齐家”、“平天下”古训的寓意，能够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意蕴及其密切关联的理解。中华传统美德中积淀的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源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和结合，是同思想文化的“转化”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②要在牢牢把握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使根植于中华大地的思想文化精华结合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之中，形成具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样式。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也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变革独特实践中的理论创新为显著特色的

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从这一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69页。

②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01-01。

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①。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变革独特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体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过程之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面向实际，着力在中国社会变革的独特实践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1942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时，陈毅撰文阐释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时，就对这种理论自觉作了这样的表达：“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②毛泽东开辟的中国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工农红军建设的理论、社会调查的方法，“如实”于中国的实际，是以中国特殊的国情为背景的，因而是“创获”于中国实际的“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正是这些基于中国社会独特实际的问题，“倒逼”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的理论创新。这就如毛泽东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理：“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③

正是“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正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样的一些道理，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铸就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实践，中国共产党更是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没有照搬苏联模式，坚持不懈地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指出：“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

^①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陈毅：《伟大的二十一年》，载《解放日报》，1942-07-01。

^③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20页。

^④ 《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514页。



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①体现于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性的理论贡献就有：实事求是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农民作为主要革命动力理论、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建设关系理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理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等等。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变革特殊实践中理论创新的成就更为显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体现的独创性的理论贡献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理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这些创新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既是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过程的科学反映和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括和凝炼。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成就时，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联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深刻地蕴含着中国特殊实践中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中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74页。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①

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两大理论成果，也是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他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毛泽东率先冲破教条主义的藩篱，最早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和主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探索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路径。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特殊贡献作出的第一次正式评价。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74页。

②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52～953页。